



六零学人文集

张昌平 著

方国的 青铜与文化

张昌平自选集



上海人民出版社

 六零学人文集

张昌平 著

方国的 青铜与文化

张昌平自选集

 上海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方国的青铜与文化:张昌平自选集/张昌平著.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2

(六零学人文集)

ISBN 978-7-208-10843-1

I. ①方… II. ①张… III. ①青铜时代文化—中国—文集 IV. ①K871.34-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2)第 146410 号

责任编辑 周 珍

装帧设计 王小阳

· 六零学人文集 ·

方国的青铜与文化

——张昌平自选集

张昌平 著

世纪出版集团

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

(200001 上海福建中路 193 号 www.ewen.cc)

世纪出版集团发行中心发行

上海商务联西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开本 720×1000 1/16 印张 20.5 插页 3 字数 348,000

2012 年 7 月第 1 版 2012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208-10843-1/K·1905

定价 48.00 元

编辑则例

1. 六零学人文集入选出生于 20 世纪 60 年代的人文科学研究者的自选集。
2. 作者自选的学术论文和学术批评结集,文责自负。
3. 入选文集经学者推荐、匿名评议产生。
4. 入选学者来自考古学、艺术史、科技史、文献学等领域,本丛书将向其他人文学科开放。
5. 本丛书不设主编,由作者自序,不强求体例统一。
6. 本丛书提倡学术的自主性、严肃性、多样性。

自序

入选参加六零学人自选集，心下惴惴。设想中够格出版自选集的，应该都是社会知名度或地位很高的学者，而我本人与这一点是不沾边的。好在自选集注重于六零学人全球性学术视野、交叉的学科追求以及独立的学术态度，如此我或许可以安然受之。

自选文集总是会勾忆起自己的学术经历和感受。在编辑本文集之际，我特别要感谢在我个人考古之路上曾经提供各种帮助的师长和朋友。回头算来，自己从1982年进入北大学习考古，对专业的接触也有三十年了。从大学毕业后天天踢球打牌无心向学、从考古所应付于抢救发掘和后来的“从政”，到今天醉心于学术，这大约算是一个异数。现如今天天龟缩在个人的精神世界里，可能让曾经对我有所期待的朋友们失望了。三十年，如果按照考古学年代分期，头十年自己基本是在被动地感知考古学，1992—2001年这十年间，才尝试围绕早期楚文化以及江汉地区其他青铜文化等做一些研究，2002年开始在出国访学影响下，终于有了一些在全球视野下研究中国青铜文明的眼界，终于能够开辟一些新的研究方法和视角。这样的逐次改变，其实正是在师友们的推助之下，自己在学术化和社会化之间作出的选择。

我在本科阶段商周考古的兴趣倾向十分明确，毕业后分工到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当时隶属于湖北省博物馆）工作，虽然首先短暂地接触到楚墓的发掘，但不久就作为讲师团到郢县当了一年中学老师，而后又被指定配合北京大学在天门石家河遗址的实习发掘，1988年开始在襄樊、宜城一带发掘周代遗址，才从新石器方向回归到商周。

1988—1992年我们连续发掘了襄樊真武山和宜城肖家岭、桐树园等遗址，这是学术界最早大规模揭露春秋晚期之前与楚文化面貌相关的遗址，对早期楚文化探索的意义自不待言。当时楚文化研究适逢高潮阶段，楚文化国际研讨会召开，《古

代荆楚地理新探》、《楚文化源流新证》等著作出版,在楚文化研究领域反响很大。相比之下,我们针对遗址的基础性工作,并未引起许多学者的重视。此时,邹衡先生碰巧考察了我们对肖家岭遗址发掘的材料,先生颇为认可我们的发掘和整理工作,并着重强调“早期楚文化探索应该从基础工作做起”,这极大地鼓励了对考古工作尚在懵懂中的我。现在看来,当时基于襄樊宜城地区西周春秋时期材料,首次建立起来的考古年代学框架是基本可靠的,也经受了近年在鄂北豫南地区考古工作的检验。

但是,襄宜地区在历史文献记载中主要属于邓、郢等国范围,并无明确作为早期楚人活动中心的依据。从另一方面来说,这里的考古学文化在西周时期承袭于周文化、春秋时期则趋同于楚文化,如何把握这一地区考古学材料从文化命名到性质的认定等等问题,在考古学理论和方法上都有相当的难度。为此,我专门求教于李伯谦老师。李先生是我本科毕业论文的指导老师,我的论文《试论二里岗文化的分期及相关问题》通过类型学比较,注意到二里岗文化早期和当时学术界认为的先商文化南关外型主要陶器器类如鬲等并没有直接的承接关系,得到了李先生较高的评价。或因如此,我的那篇从未发表的本科论文被一些校友在论著中引用。针对真武山为代表的周代遗存,李先生为我分析了考古学文化研究中文化与亚文化、考古学文化与国族文化诸层次的关系,正是在先生的指导之下,我完成了《试论真武山一类遗存》等早期楚文化研究文章,提出真武山等遗存与晚期楚文化存在考古学文化上的关联等看法。这类文章在近年学术界重回早期楚文化研究的热潮中,仍然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楚鬲研究是我从另一个角度尝试对早期楚文化探索所作的努力。20世纪八九十年代,商周考古的一个主要任务和研究热点,是根据考古学文化或其典型因素的谱系,来探索某一国族的早期历史。楚式鬲在结构上被学者们视为不同于商周文化系统陶鬲,因之成为追溯楚文化渊源的标志物。我当时也认同这一研究思路,只是认为其他学者分歧的主要症结在于占有材料的片面性。在系统梳理楚地出土两周时期各类陶鬲材料之后,我的基本结论为西周文化陶鬲是其后楚鬲的源头。但一个简单的道理是,江汉地区二里头文化时期以来即处于中原文化的辐射之下,西周王朝建立之后,周文化对于江汉地区的强势影响自然会使这一地区文化纳入其轨迹,因此即便楚人是江汉土著,也极有可能接受周文化的洗礼,周式陶鬲在此背景之下形成其后的楚式陶鬲,并非没有可能。显然,以考古学文化的谱系来逆推楚文化的形成进而推导楚人活动的轨迹,在方法上存在缺陷。因此,我在此类研究文

章发表之后,通过对早期楚文化研究的回顾,检讨了这种研究方法的科学性。

显然,早期楚文化研究需要新的路径和方法。如果我们检视学术界对夏文化的讨论、对早期晋和秦文化中心区域追寻所取得的进展,不难发现历次较为重要的进展几乎都是建立在宫殿、国君一级墓葬、中心聚落等高等级遗存的发现之上。对早期楚文化探索而言,去具体定位楚都丹阳在历史学和考古学上都有困难,但我们知道楚国至少自西周晚期开始就较为强大,探寻这一时期及其后相关区域内那些规模较大、堆积丰富、规格较高的聚落和聚落群,进而明确其时楚文化中心区域,则具有较强的可操作性。《早期楚文化中心区域的考古学观察》就是按照上述思路的一个提纲挈领的表达,这个想法也在其他不同场合有过阐述,并对一些学者特别是年轻人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因此在近年常常可以看到类似思路的研究成果。个人觉得自己探索早期楚文化的另一个较为新颖的思路是通过青铜器铭文辞例在使用上的时空范围,来讨论春秋中期之前楚国高级贵族的活动区域。《由“择其吉金”等楚系金文辞例看楚文化因素的形成与传播》提出春秋早中期楚国中心区域应在鄂北豫南一带,并推测在春秋早期楚国贵族应该使用“用其吉金”这样的辞例习惯,这一推测,在最近上海博物馆收藏的楚大师登编钟铭文中得到了确证,由此也说明这些新路径的可操作性。

曾国研究是我动手最早而着力最多的项目。1988年我到随枣走廊地区配合全国第二次文物普查,时任省考古所所长的陈振裕先生嘱我要关注曾国都城等历史问题,这是我研究曾国问题的简单缘起。伴随曾国问题的研究,我在随州调查、勘探并发现了战国时期曾国陵园的擂鼓墩墓群,调查、勘探,并和刘建国先生合作运用遥感技术发现春秋时期的安居城址,主持《孔家坡汉墓简牍》报告的编写,加之进行中的曾侯乙墓陪葬坑发掘资料的整理,应该说,随州是一个倾注了我个人心血的城市。在研究上,由于随、枣一带屡屡出土曾国青铜器,但历史文献明确记载这一带为随国之地,故学界称为“曾国之谜”。曾国青铜器属于两周之际前后的批次最多,这是一个在青铜器发展上缓滞的时期。我就这些青铜器提出的年代分期,在近年晋侯墓地青铜器等新出材料的验证下,其框架是基本合理的。正是根据曾国青铜器的年代及文化特征的变化,我提出曾国可能先后对应于历史文献中的缙国和随国,这是在“曾国之谜”诸多讨论中真正依据考古材料提出的假设。其中的一些预设,在最近随州叶家山基地的考古发现中,已初显端倪。

其实,曾国是历史文献中的哪一个国家并非是我们研究中的终极目的。将曾国作为两周时期诸侯国的一个缩影,由青铜器入手探讨其文化、特别是作为诸侯国

所反映的周代社会状况,则是考古学所应该关注的。由此类研究来建构古代国家和社会,较之狭义历史学所提供给我们的场景要丰富得多,因此这个方向也似乎是我们研究青铜器的一个趋势。对于曾国这样一个在两周时期分别作为诸侯国和附庸国的小国而言,在深入细致地观察其青铜器的基础上,研究青铜器所反映的制作背景、政治制度、疆域和都城变迁等等,是我们能够比较有把握地展现出来的东西。这样一个构想具体体现在文物出版社分别于2007年和2009年出版的《曾国青铜器》、《曾国青铜器研究》之中。《曾国青铜器研究》能够紧扣一个小国的历史地位的研究主题,我个人觉得在研究形式和研究方法上的意义大于该研究结论的本身,从一些年轻学者对该书的评论中,我也感受到了这种认同。得益于自己2004—2007年重回北大的学习和思考,得益于孙华师及北大其他许多师友的影响。在体现上述研究思路的文章中,收入本文集的《曾国问题研究》和《以曾侯乙墓为中心的曾国青铜器研究》是分别对于历史学和考古学问题的简要概括。其他若干以曾国遗存为中心的研究文章,如关于擂鼓墩墓地、安居城址、曾侯乙墓玉器、青铜器铭文的制作等等,则基本上是上述主旨之外的个案研究。

对于我们这些关注商周王朝周边文化的人来说,区域之间的文化关系是一个永久的话题。在研究习惯上,我们的观察方向往往是由周边而及中心,因此更容易聚焦和观察到周边物质文化的个性特征,这或者有别于由中心而及周边所得到的文化同一性的观感。在江汉地区,《五十年来湖北省文物考古工作》是从历时性;《夏商时期中原与长江中游地区的文化联系》是从区域间所作的观察。在讨论中心与周边的文化关系时,我们避免传播和影响这样较为空泛的结论,尝试追寻物质文化相似性或个性所形成的背景。由于青铜礼器作为青铜时代的奢侈品和社会等级的标志物,包含了较多的社会生产和文化交流及传播方面的信息。青铜器的个性特征,至少可以提供给我们两个方面的具体信息:一是反映文化传播的方式,二是揭示青铜器独立生产能力。同时,这两个方面又分别可以折射出更为重要的社会意义。例如,在对殷墟文化时期长江流域尊、罍、甗等器类的研究中,这些青铜器无论是铸造技术还是装饰构图,都具有不同于殷墟文化青铜器的特点,说明它们是具有中原文化之外的生产性质;但在另一方面,长江流域青铜器中一些不同于中原文化的特点,又在某些器类中内聚为高度一致的地方特征,暗示这些出土地点不同的青铜器,有着相同的生产背景。

伴随着考古学文化研究的推进,目前商周青铜器发展的年代系列框架已基本完备,青铜器铭文等所反映的历史信息往往在器物出土时基本被揭示。因此,青铜

器研究在未来如何走向,是我们这一领域的学人需要面对的问题。我个人理解,在现阶段研究的一个方向,似乎应该是将青铜器外在的器形、装饰、铭文、造型风格等各个方面,结合到器物内在的生产环节中,由此作综合且细致的考察,并以此方法再来进一步探究青铜器所反映的更深层次的问题。因此,青铜器工艺研究不再只是金属史研究者所关注的技术研究,而更应该是考古学者理解青铜器造型、装饰等因素的基础。从小的方面来说,由于生产工艺与器形、装饰等因素往往相互影响,我们因此可以理解何以二里岗文化时期之前的鼎足一定会作空锥形,而在春秋战国之际的鼎足是先铸铸接。我们也可以明白何以殷墟文化时期青铜器多见地纹与半浮雕结合的三层花纹,而东周时期的装饰分化为细密的平面纹饰和突出器表的爬兽。从大的方面来说,青铜器作为中国青铜时代最为重要、复杂的手工业,生产工艺的变化,折射的背景可能是匠人的社会文化背景,当然也可以是作坊生产组织或分工的发达程度,可以是政治中心对于技术的专控或者技术群体跨区域的流动,还可以是生产资源或经济实体对于生产或粗放或精细的影响,甚至可以是礼器的社会价值观在生产上的体现。近年来,自己在青铜器方面的若干研究,就是尝试类似的由生产而及社会的研究。

学术史和评论也是我的兴趣所在。文集集中的两篇批评,颇多贬挹之辞,对象或涉及我尊重的前辈,或涉及关系不错的朋友,这样做似乎很不近人情。但我们知道,在西方学术界,学术批评是学者们既绕不开且十分热衷的话题,也因此成为学术发展的重要推动力。西方汉学界一些极度尖锐的批评,许多故事为我们大家所知。个人认为,我们国内的学术评论太多歌颂而缺乏客观的批评,这实际上制约了研究的发展。我们呼吁更多严肃且挑剔的评论,成为引导和刺激研究的动力。

以上所述基本是自己考古的一些经历和研究的若干方向,收入本文集的近二十篇文章大体也是自己这些经历和研究感悟的反映。基于学术史的考虑,文集所选各文,除了个别错别字之外,均未作修改。有些成果,如收入本文集的《早期楚文化探索二十年》、《二里岗文化至殷墟文化时期青铜器范型技术的发展》分别是与陈振裕、刘煜等先生合写的。未收入文集的其他著述,特附列篇目于书后。目录中论文数量虚多,特别要指出的是有些小文并不能算得上学术论文,仅或能反映我自己的一孔之得而已。至于选入本文集的论文,除了反映我所涉猎的方向外,挑选时偏重于一些发表在较冷僻出版物之上的文章,以飨同好。文集中若干篇文字冗长,我实在不敢奢望读者有耐心去看的。

最后借此作一个题外的说明，我的一些文字及观点有时会有意无意地被有的学者“雷同”，或者被更高明的学者在“错误的观点”这样的话之后作出引注，暗示读者该错误源自于我而不是我已经提出他正在论述的东西。对此我也曾经郁闷，但念及这种特殊的方式或许也算得上是对于学术的一点贡献，最终释然。

2011.7.4 于武昌

目 录

早期楚文化探索二十年	... 1
楚鬲研究	... 19
试论真武山一类遗存	... 51
早期楚文化中心区域的考古学观察	... 61
由“择其吉金”等楚系金文辞例看楚文化因素的形成与传播	... 65
三峡地区的早期楚文化研究	... 74
以曾侯乙墓为中心的曾国青铜器研究	... 87
曾国问题研究	... 108
关于擂鼓墩墓群	... 125
曾侯乙墓玉器的改制	... 135
五十年来湖北省文物考古工作	... 144
夏商时期中原与长江中游地区的文化联系	... 163
论湖北襄樊地区两周甲骨	... 171
论殷墟时期南方尊和鬲	... 180
北美地区所见中国商时期南方或南方特征青铜器	... 193
战国晚期楚墓的断代与郭店 M1 楚墓的年代研究	... 212
二里岗文化至殷墟文化时期青铜器范型技术的发展	... 226

商周青铜器铭文的若干制作方式——以曾国青铜器材料为基础 ... 239

乳钉雷纹蛙饰甗与四点配列式鼎——和李朝远先生讨论中

涉及的早期青铜器的两个具体问题 ... 252

论济南大辛庄遗址 M139 新出青铜器 ... 262

中国青铜时代青铜器装饰艺术与生产技术的交互影响 ... 272

《盘龙城》与盘龙城 ... 294

关于曾侯乙尊盘是否采用失蜡法铸造争论的述评 ... 304

早期楚文化探索二十年

早期楚文化探索是从历史学和考古学角度为解决楚族来源、楚都丹阳地望、楚国家的形成及早期发展诸方面问题所进行的研究。历史学通过对文献记载的梳理,对楚族来源问题主要形成了大家熟知的“东来说”、“土著说”、“北来说”几种看法,并相应地在丹阳地望上提出“当涂说”、“枝江(或秭归)说”、“丹淅说”。但历史文献的局限性也是显而易见的,不同文献对于同一问题的记载往往分歧很大,即使是同一文献也会因为理解不同而得出相反的结论。例如,按照《史记·楚世家》“重黎为帝喾高辛居火正,……帝喾命曰祝融。……吴回为重黎后,复居火正,为祝融。吴回生陆终,陆终生子六人,……六曰季连,半姓,楚其后也”的记载,楚先祖祝融是追溯楚族来源的关键性人物,但各家对祝融却各有不同的解说:东来说以为祝融八姓各族所在地主要在今河南、山东、江苏交界处,即楚先族是属于东方集团的人^①;土著说依据炎帝亦称神农氏、列山氏,以其在今湖北随州厉山一带,进而认为祝融亦出自江汉地区^②;北来说则据“郑,祝融之墟也”,即以楚族应出于中原^③。又如判定西周时期楚都丹阳地望的一条重要文献,“昔我先王熊绎辟在荆山”(《左传·昭公十二年》),依土著说的理解荆山是指广义的荆山山脉而言^④,持北来说的学者则考证与楚族活动有关的荆山有5处之多,丹阳只是在某一处具体的荆山之旁^⑤。因此,单纯从文献的角度,某一家说法很难找到驳倒其他观点的反证材料。何况发现像周原卜骨“楚子来告”^⑥或包山楚简记载有楚祖“鬻熊”^⑦那样重要的出土文献,也是极为偶然的。在文献资料有限的条件下,近年来已经很难看到史学界提出新的见解。

考古学对于早期楚文化所关注的问题与历史学一致,主要是对早期楚文化形成过程、特征、主要文化因素来源、文化中心区域诸问题进行探索。这一工作的前提是在对晚期楚文化认知的基础上才得以进行,因此可以说早期楚文化的考古学探索是楚文化研究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当20世纪30年代人们对楚文化的了解仅限于一些传世铜器时,对楚族来源于东方的推测^⑧当然欠缺依据。当时在安

徽寿县、湖南长沙等地虽出土有大量战国中晚期楚国文物,但盗掘的性质限制了人们对于楚文化的认识。20世纪50年代,湖南长沙、常德地区楚墓的发掘使楚文化进入了科学的发掘与研究阶段,但当时对楚文化的特征及年代等基本问题的认识仍相当模糊。进入60年代特别是70年代中叶,大规模的农田水利建设,使湖北、河南、湖南、安徽等地楚文化遗存纷纷呈现出来,这些发现以湖北江陵纪南城遗址一带最为突出:1965年以后发掘了江陵望山沙冢^⑨、天星观^⑩等大型楚墓,1975—1976年大面积揭露纪南城宫殿、城垣等遗存^⑪;小型楚墓发掘主要有1975—1976年江陵雨台山墓地558座^⑫和1977—1979年当阳赵家湖墓地297座墓葬^⑬。几乎与此同时,河南浙川下寺发现春秋中晚期楚国贵族墓地^⑭等等,这些发现已经可以初步总结东周时期楚文化特征和建立楚墓年代序列。不过,当阳赵家湖楚墓年代不早于西周晚期,春秋中期以前楚文化面貌仍不够明晰,纪南城遗址如果作为楚国都城年代也只属于战国时期。于是,探索春秋中期以前楚文化和早期楚国都城成为早期楚文化研究的重点。在此背景下,1980年召开以楚文化研究为中心议题的第二次中国考古学会年会,会上正式提出楚文化探索的问题^⑮,标志着有意识地进行早期楚文化探索的开始,并很快掀起一股研究热潮。

近二十年来,早期楚文化探索已然取得一系列突破性成就,同时也提出了许多新的问题。目前这项工作进入相对空寂的阶段,回顾近二十年来的工作历程,对过去成就的总结和问题的检讨,无疑是适时和必要的。

一

考古学文化研究通常情况下是对某类已知文化遗存的分析,而对历史上某类民族文化的探索则是试图寻找分析出未知的文化遗存,这种未知的文化遗存在时空关系上应合乎该民族文化的活动范围,在文化特征上发展趋势应与该民族文化已知部分一致。早期楚文化的探索当然也应当遵循早期楚人活动的时间、空间范围,即“楚文化既属于历史时代,则一定要结合历史文献,将考古遗迹和遗物,与文献上的‘楚’联系起来”^⑯。因此,早期楚文化的探索工作首先应对历史文献提出的“东来”、“土著”、“北来”诸说区域内的考古学文化进行分析,看哪些考古学文化“与楚文化确实有相似之处,有渊源关系”。在这方面,近二十年取得的进展较大。

东来说(当涂说)。

认为楚人来源于淮水下游一带,楚都丹阳在今安徽当涂(《汉书·地理志》)。

但积年的考古资料表明,东来说涉及的地区多属于淮夷和早期吴文化范围,其文化面貌与楚文化完全没有渊源关系,直到春秋中晚期,楚文化才真正东渐到达江淮地区。东来说虽然有较早的文献依据,但与出土文物的情况相悖,因此在早期楚文化讨论之初,各家均不约而同地摒弃了这一说法。

土著说。

认为楚文化一直是在江汉地区土生土长起来的,其文化基础是以江汉地区各阶段民族文化为主体,同时也接受了中原青铜文化的影响;这支文化的孕育、形成过程中,自始至终是以鄂西的沮漳河流域为中心,沮漳河一带发现的楚文化遗存属于典型楚文化。在研究方法上,土著说采用从下而上的追溯和从上而下的探寻方法^{①7},试图分析出早期楚文化。

在自下而上的追溯方面,土著说确定,既然赵家湖墓地是一处没有间断、延续发展的楚文化典型墓地,那么该墓地春秋早期乃至西周晚期的墓葬也应属于典型楚文化。以此为“寻找西周中期以前的楚文化遗存的器物形态学上的可靠基点”^{①8},始自20世纪70年代末,湖北考古界曾经投入了大批力量,在沮漳河中下游流域作了长时间的调查与探索,除当阳赵家湖墓地之外,迄今发现的可能与早期楚文化相关的遗存主要还有:

江陵张家山遗址。位于荆州古城之西,遗址包含有石家河文化及早商、西周晚期、东周几个时期遗存;西周晚期遗存陶器有鬲、孟、盆、瓮、罐、豆,发掘者认为它们正是东周时期楚文化相应器类的前身。“因而以张家山为代表的西周晚期的文化应属于楚国早期的物质文化”^{①9}。

江陵荆南寺遗址。与张家山遗址仅隔300米。两个地点原来应属于同一遗址。该遗址比张家山遗址多出大溪文化时期遗存,商周时期遗存极为丰富,两周之际的遗物均为陶器,多夹砂红陶和红褐陶,器类有鬲、甗、豆、盆、罐等,鬲包括有大口、小口两种,其性质被认为属于“典型的楚文化遗存”^{②0}。

江陵梅槐桥遗址。位于沮漳河之东,主要堆积属于晚商时期土著文化——以鼎、釜为代表器类的周梁玉桥文化,其上的堆积出有西周晚期偏早阶段的鬲、豆、盆,其中鬲为深腹、高瘪裆^{②1},器物特点与荆南寺遗址接近。这是目前在沮漳河一带所见可能与早期楚文化相关的最早阶段遗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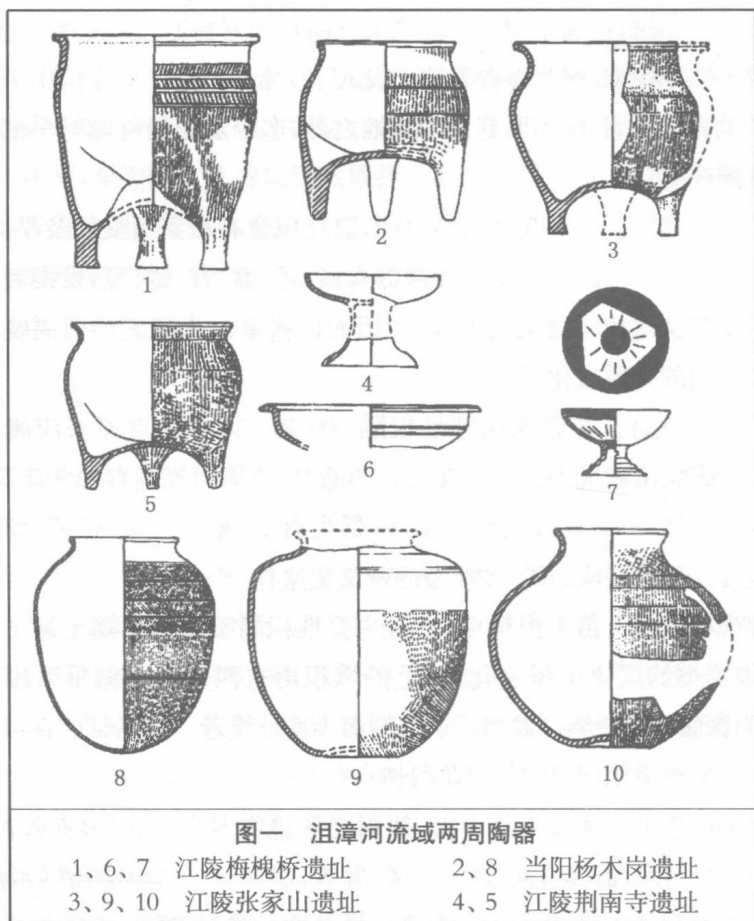
江陵摩天岭遗址。堆积不甚丰富,两周之际遗物多为陶器,多夹砂褐红陶,有一定数量的磨光黑陶,器类有鬲、甗、孟、罐、瓮等,器物与“东周时期楚文化中出土陶器制作风格基本上是一脉相承……该遗址属楚文化范畴”^{②2}。由于该遗址位于纪

南城内西北部,因此尤为土著说所看重^{②③}。

当阳磨盘山遗址。位于赵家湖墓地之北,据称遗址面积达4.4平方公里^{②④}。周代堆积可分上、下两层,陶器均以红陶为主,器类有鬲、甗、孟、罐、豆、板瓦、筒瓦,发掘者认为陶器时代“大体相当于西周晚期或稍早”,是鄂西地区“两周时期最早、最大的楚文化遗存”^{②⑤}。

当阳杨木岗遗址。位于漳河西岸,遗址下层为大溪文化遗存,上层属春秋早期遗存,出有鬲、罐、豆、瓮等陶器,其中鬲以小口鬲为多,这里亦属于“较早的楚文化遗存”^{②⑥}。

类似这种性质且时代在西周晚期或春秋早期的遗存较重要的还有枝江虾子沟、赫家洼子遗址^{②⑦}等,这些遗址两周时期的堆积都不甚丰富,出土遗物基本为陶器,器物特点有较多的共性:陶系以夹砂红褐陶为主,有一定数量的泥质磨光黑陶,纹饰以粗绳纹占绝大多数,泥质陶特别是磨光陶器上常饰有三角形、波浪形暗纹,陶器以鬲、甗、孟、罐、豆为基本组合(图一),它们与赵家湖墓地相应阶段遗存性质应当相同,陶器的



器形特点的确与春秋中晚期楚文化存在有较密切的关系。不过这些遗存极少数可早至西周中晚期之际,土著说所寻找的西周早、中期楚文化遗存则一直没有突破性进展。

另一方面,土著说强调江汉地区史前时期大溪文化、屈家岭文化、石家河文化(当时亦称湖北龙山文化或季家湖文化)之间的承袭关系,或将楚文化的渊源上溯到屈家岭文化^②,或更认为“鄂西那支大溪—屈家岭—季家湖文化,可能是楚人的祖先所创造的”^③。再由此向下探寻,土著说又将江汉地区商、西周时期文化和史前文化一起纳入先楚文化的范畴。在他们看来,商、西周时期文化既承袭了史前文化的一些作风,许多文化特征又为东周楚文化所继承^④,具体而言之,则“荆南寺遗址的红陶系文化(指土著文化因素——引者),正是东周时期楚文化的前身”^⑤。“周梁玉桥那种遗存,至少是构成后来的楚文化的重要因素之一”^⑥。甚至认为张家山遗址存在的石家河文化、商时期文化和西周时期的早期楚文化是“从地层上找到了它们的发展关系”^⑦。现在看来,过去这种单一连续式的推论是过于简单了。因此土著说补充:“最初的楚文化,便可能包括本地的土著文化(如果形成于鄂西,这便是江陵荆南寺、沙市周梁玉桥那种商时期的遗存),早周文化等文化的因素,由于荆南寺和周梁玉桥的遗存本身又包括了具有石家河文化……多种文化因素,楚文化的源头实际是更加复杂的。”^⑧

在早期楚文化中心区域——丹阳地望问题上,土著说在认定纪南城为楚郢都的前提下,分别有赞同枝江说、秭归说以及先秭归后枝江说等不同意见。

枝江说文献依据主要是后人所引汉晋时期的记载,如《史记·楚世家》《正义》引颖容曰:“楚居丹阳,今枝江县故城是也。”此丹阳或指今当阳季家湖城址^⑨。在持这种观点的学者看来,季家湖城址周围分布有规模大、规格高、墓葬较多的赵家湖楚墓群和青山楚墓群,城址范围较大,城内发现有多处夯土台基,超过了一般古代城址的规模,特别是在城内夯土台基中出土有春秋时期曲尺形青铜构件和“秦王卑命”甬钟^⑩,说明城址与楚都性质相符合^⑪。不过,在对该遗址的发掘表明,除发现新石器时代晚期文化层外,季家湖城址城壕和城内堆积仅见有晚于春秋中期的平折沿鬲和釜、长颈罐、细柄放射状暗纹豆等遗物,城址使用年代当不早于东周^⑫。这与丹阳属于西周时期的历史情况矛盾。因此,又有学者提出季家湖城址应当是春秋时期的楚郢都^⑬,以弥补纪南城只是战国时期城址的缺陷。

枝江说还举出当阳磨盘山遗址可能是丹阳的看法^⑭,但“磨盘山下层所出诸器……无明显早于同地区其他确属西周晚期鬲文化者,故仍当属西周晚期”^⑮。遗址年代与楚都丹阳仍有差距。因此枝江说目前已经很难找到与早期楚文化活动中